

张炎《词源》研究综论

罗海燕¹, 于广杰²

(1. 天津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2.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171)

摘 要:张炎《词源》体现了他主要的词学思想,对当时与后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对《词源》的研究几乎从未断绝。20世纪之前,《词源》研究着力于考证其版本内容以及与《乐府指迷》的关系,并阐述了其词学理论的承继与开拓,肯定了它在词史上的地位。20世纪以来,《词源》开始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界,呈现出繁盛局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体现在词旨概论、“雅正”考辨、“清空”释解、价值考量与影响等方面。进入新世纪,张炎《词源》研究接续了20世纪末的余绪,并出现视角多元化与体系化、细化的特点,形成了新的研究态势。

关键词:张炎;《词源》;雅正;清空;词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5-0070-07

张炎是宋元之际的词学大家,除创作《山中白云词》八卷外,尚著《词源》两卷。后者集中体现了其词学思想,在词学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后人对《词源》的研究几乎从未断绝。同时,随着时代变迁,《词源》研究在学术史上也呈现出阶段性特色来。截止到目前,《词源》研究更加趋向全面和客观,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存有一些问题与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加以探讨。

一、20世纪之前的《词源》研究

《词源》成书于张炎晚年,他曾在《词源·序》自述其创作的大概时间与初衷:“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僭述管见,类列于后,与同志商略之。”^{[1]255}其书一出即引起了时人巨大关注,即使历经元、明、清数代,学者对《词源》关注的热情依然不减。不过,20世纪之前,对《词源》的评论多集中于相关序跋、词话和目录学著作中。此外,也有人 对《词源》进行了版本辨析与内容疏证、考校及整理。

陆文圭《词源·跋》称:“西秦玉田张君,著词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数,演六六之谱,按月纪节,赋情咏物,自称得声律之学于守斋杨公、南溪徐公。”^{[1]260}明确了《词源》为上下两卷,并指出张炎声律之学的师承。但由于后人妄删,导致现存版本《词源》序位于下卷开头,有学者因此误认为《词源》上卷本不存在,乃后人增加。陆文圭由宋入元,他见到的《词源》理应是初本,据其跋即可知:《词源》本来就是两卷。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陆跋所反映的当时人的词学观念,与我们现在对词的界定不尽相同。他认为:“词与辞字通用,释文云:意内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声,声生律,律生调,故曲生焉。”^{[1]260}而要想准确地理解张炎的词学术语和观点,须首先明确他本人对词的界定。张炎门生陆辅之《词旨》称:“《词源》云:‘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尽,指迷之妙,尽在是矣。”^{[2]308}则明确提出把“清空”作为指导人们填词的纲领。清人江藩认为:“乐府一变而为词,词一变而为令,令一变而为北曲,北曲一变而为南曲。”^{[1]260}所以,他以北曲映证《词源》之声律论,论述了《词源》所谓之“乐色管色”、“管色应指字

收稿日期:2013-0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元代文学格局与走向研究”(12BZW036)

作者简介:罗海燕(1982-),男,河北平山人,文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天津文化与文学。

谱”、“宫调应指字谱”、“拍眼”等与北曲之宫谱的对应关系。江藩是感于当时作词者不知宫调为何物,不足以言词,故张扬《词源》之声律,并作此议论。四库馆臣《四库未收书提要》卷三,一方面详述《词源》上下卷之内容,认为上卷所论记“与姜白石歌词九歌琴曲所记用字纪声之法,大略相同”,并称此书“足以考见宋代乐府之制”。另一方面又考镜《词源》又名《乐府指迷》的原因:“自明陈仲醇改窜炎书,刊入续秘笈中,而又袭用沈伯时乐府指迷之名,遂失其真微,此几无以辨其非。”^{[3]112}清嘉庆时秦恩复为《词源》作跋,在记述《词源》内容后,详细辨明陈继儒所谓的《乐府指迷》其实是以《词源》原下卷为上卷,又以陆辅之之《词旨》作下卷。他高度评价《词源》为“洵倚声家之指南也”^{[4]271}。咸丰时伍崇曜跋评《词源》:“称究律吕之微,穷分寸之要,大晟乐府,遗规可稽,则《白石道人歌曲》,晦叔《碧鸡漫志》而外,惟《词源》一书为之总统。”^{[4]272}许增《榆园丛书》称《词源》:“穷声律之官妙,启来学之准范,为填词家不可少之书。”^{[4]170}他以秦恩复本为底本重刻《词源》,同时又参校戈载之校订本,相对而言,谬误较少。杜诏《山中白云词序》称:“读其《乐府指迷》一书,为古今填词准则。夫岂斤斤墨守尧章者。”^{[4]170}又,曹一士在《山中白云词后序》云:“今观其《乐府指迷》,于声律之学,研究之深,其授受皆有师友,苦心精诣,必多独得于中者。”^{[4]171}两人都指出了张炎理论的独创之处。在人人皆视张炎师承姜夔等师友的舆论中,他们特别地强调了张氏词学理论的独创、发展处。沈曾植对于“雅词”,说过一段有启发性的话,他说:“宋人所谓‘雅词’亦有二义。此《典雅词》义取大雅。若张叔夏(炎)所谓‘雅词协音,一字不放过者,则以协大晟音律为雅也。’”^{[5]508}

可以看出,继元人之后,尤其是晚清诸人,对《词源》研究较盛。在进入20世纪之前,《词源》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比较详尽地明确了《词源》的内容。二是辨清了《词源》与《乐府指迷》间的纠葛。三是阐述了张炎词学理论的师承,并指出其继承基础上的开拓意义。四是高度评价了《词源》在词学史上的地位。但这些研究不可避免地存有一些不足,例如这一时期的评论明显缺乏理论性、系统性,评论的主观性与随意性较强。

二、20世纪《词源》研究

进入20世纪,《词源》研究被纳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阈,并呈现出繁盛局面,取得了巨大成绩。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三次巨大变化: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给文学研究带来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词源》研究也随之呈现出阶段化的变迁性。现以此三段为时间之维,对《词源》研究历程略作梳理。

新中国成立以前,尤其是民国时期,《词源》研究一方面承继清儒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西学影响很大,开始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域。首先是蔡桢作《词源疏证》,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对《词源》进行疏证的专著。其旁征博引历代音乐典籍,并时有结合西方音乐理论加以对照,对《词源》研究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吴梅、吕澂及蔡桢序与导言分别反映了当时词学家的词学观念。他们几乎都一致强调词的声律特性。此外,曾毅《中国文学史》^[6]与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7]都从音韵方面对《词源》价值予以肯定。值得一提的是,胡云翼《宋词研究》却持不同观点。胡氏认为《词源》专讲词之作法,讲求字面、用事、句法、虚字、清空……崇尚雕琢典雅,在作法上转来转去。对《词源》上卷不置褒贬,而对下卷则加以否定^{[8]169-170}。朱东润发轫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批评史大纲》论《词源》:“宋人言诗,好称命意,《词源》亦袭此说。”“玉田论词,揭出‘清空’二字,为《词源》一书最扼要处”。他认为张炎论词与江西诗派关系密切,“江西诗派论诗好言诗法,言诗眼,玉田论词亦言句法,言字面”。并指出《词源》与沈义父《乐府指迷》的不同之处:“玉田论及古今词人小令,仍以《花间集》中诸人为则,对于清真,许与虽深,未肯遽称为词家正宗,此其与沈伯时不合处。”^{[9]178}刘大杰初版于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强调,“清空”是张炎提出来的最高境界,并加以解释道:“他(指张炎)所说的清空,就是空灵神韵,同严羽论诗的意见相同。”^{[10]733}可以说,这是20世纪以来,较早指出张炎清空理论与严羽诗论有承继关系的观点,虽然其论述有些简略,但此后将张炎与严羽理论相联系比较的研究多是受此启发。

50年代以后,较之大陆,台湾地区《词源》研究相对兴盛,如有志雄《张炎〈词源·讴曲旨要〉考释》、刘纪华《张炎词源笺订》、徐信义《张炎词源探究》及《张炎的词学批评》等。而大陆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夏承焘的论著,其《读张炎的词源——词史札丛之一》指出:《词源》中论音律与词章的关系一节,对于死腔盲填的作家,有着“发膏肓其废疾”的作用,算是张炎几个论点中最高明的见解。上卷论音律的14篇,是张炎对词学贡献最为精粹的部分,其价值高于王灼的《碧鸡漫志》,与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同为词林瑰宝。夏承焘还作有《词源注》,但未选取《词源》上卷与下卷《音谱》、《拍眼》条,而是将最后一条《杨守斋作词五要》移作《杂论》的注文^[11]。又在《词源注·

前言》称：“张炎论词的最高标准是‘意趣高远’、‘雅正’和‘清空’，前二者是南宋词人的论调，‘清空’则是他独创的主张。”^{[12]6}而进入80年代以后，《词源》研究的视角和层次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下面按其侧重点，分类而论。

1. 概论《词源》主旨

对于《词源》的主旨，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尽一致的答案。曹保合《谈张炎的清雅词论》一文认为，张炎的清雅词论包括“雅正说”、“清空说”、“师途说”。“雅正说”主张脱俗倡雅，认为康、柳的艳词和辛苏的豪气词都不是雅词。张炎所倡导的雅词，实质上是雅化了的婉约词。“清空说”强调“词要清空，不要质实”，这导致了张炎“清空说”虽有独见，却有偏见。“清空”和“质实”各有长短，因此，创作清空词要先质实后清空。张炎的“师途说”，包括师从对象和作词途径两个方面。师从对象不应仅以周邦彦为师，应由数人组成一个词人系统。作词途径是：以周、姜、史、吴为则，立意追求雅丽、骚雅，用笔追求句法、字面^{[13]44-49}。杨海明《论〈词源〉的论词主旨——兼论南宋后期的词学风尚》则认为，北宋词论崇尚“自然”的风格和美感，而《词源》则偏嗜那一种“研炼”之功。张炎论词主旨为：“深加锻炼”和“极要用工”。南宋后期词学风尚突出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音律的研究；二是炼字、炼句；三是用事、用典；四是“比兴”、“寄托”。南宋后期的很多“雅词”，存在着一种雕饰过分、“刻则伤气”的毛病。对此，张炎等人自己也已有所觉察并提出了补救主张，即在“雕琢之极”另要出之以自然^{[14]85-94}。杨海明《张炎词研究》则把张炎词论归纳为四个方面：（1）张炎论词的总纲——雅词说。“这种雅词的具体标准，一是思想内容方面要抒写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雅情逸致（这并不排斥传统的言情题材），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审音协律、琢句炼字）须加推敲锤炼；两者结合，就使词从内容到形式都能达到醇雅、精粹的境地”。（2）“婉丽”、“清空”的风格论。（3）反映时代风尚的文体论。（4）注重锻炼的修辞、技巧论。张炎论词的重大局限是其“颇为狭隘的艺术观和审美观”——特别是他对辛派爱国词作的贬低以及对词的思想性的忽略^{[15]186-198}。杨佐义《张炎〈词源〉论词标准初探》一文认为，《词源》提出的“意趣”、“雅正”、“清空”三个论词标准，并不是平行的、互不相关的，而是以“雅正”为中心、为根本的。但《词源》的雅正说又不同于其前的雅正说，因为它给雅正说注入了意趣和清空两个新内容。在《词源》看来，只有清空中有意趣的雅正之词，才是最理想、最合标准的词作。这个理想、标准的体现者，首推姜白石，苏轼也可算作一个。“清空”这个见解、标准，虽可算作张炎独创，但它必须依附于雅正，才能进入《词源》论词标准系统。虽然《词源》的论词标准还有这样那样的局限、谬误（如反对质实，反对豪气词等），但把它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这个论词标准显然就具有新的理论意义。它既是对两宋词形式、内容、意境等方面创作经验的一种总结，也是对当时词学理论研究的一种总结，因此在词学研究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16]81-86}。

2. 考辨“雅正”

张炎提出“雅正”一词，而对其内涵的认识历来存有争议。邓承奇认为张炎的“雅正”是“内容无邪，语言典雅，风格既不粗豪放纵又不靡曼软媚”^{[17]48-50}。刘庆云、谢国荣《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则认为，张炎的“雅正”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意趣高远，具《骚》、《雅》遗意。二是言情之作须出之于高雅。三是要求婉转蕴藉，不可率直，虽发意颇高，而不能蕴藉以出，亦不足以称“雅”^{[18]96-102}。单书安《张炎词论浅议》提出，张炎之“雅”着重理解为表现内容方面似更妥当，此外，张炎所谓“雅”主要还是指思想感情的“雅”^{[19]77-79}。孙立《张炎词学理论的美学意义》则认为，其雅正理论内涵大致分为三个方面：首先重“浑厚和雅，融化诗句”，“软媚中有气魄”，反对“失之软媚而无所取”。要求作词必须通体妥溜，意蕴醇厚而又不见痕迹，外表柔媚而又内蕴生气。其次，“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雅正之音”。再次，欲立新意，精炼辞句，自成一家，就须“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20]51-55}。杨佐义《张炎〈词源〉论词标准初探》则不认同夏承焘关于雅正解释，认为《词源》一方面将词之雅正同古之雅正乐诗联系在一起等同看待，并为“雅词之落落”感到忧虑，从而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上；一方面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这就明确地将传统的“诗言志”之精神引入了其雅正说，为词专主言情向志情兼得发展留出了一条理论通道。另外，张炎主张“要删削靡曼之词”、“屏去浮艳”，但并非反对词之言情。他说“簸弄风月，界线，陶写性情，词婉于诗”，但以为言情要有个度——“稍近乎情可也”，如超过这个“邻乎郑、卫”，“为风月所使”，“一为情所役”，就会失去雅正之音^{[16]81-86}。

3. 释解“清空”

“清空”一说，是张炎提出的具有开创性的词学主张。孙立《张炎词学理论的美学意义》^{[20]51-55}分释“清”与

“空”,认为“清”赋予艺术形式以外貌,“空”则是注入神韵于词体。词境能空,方能提供给欣赏主体以充分的想像空间,致使审美主体联想纷呈,“神观飞越”。在他看来,张炎“清空”之说,是对艺术境界表现形态朦胧感受的直觉概括。谢桃坊《宋词辨》一书特别提出,张炎精通音律,《词源》上卷讨论音律,下卷谈作词方法,而在词法中贯穿着以“清空”论词。“清空”细味其含义有清畅爽健的意思,因为“峭拔”表示劲健而有骨气,“凝涩晦昧”的反义则意味着清疏流畅^{[21]276}。谢氏认为,“清空”是张炎词论的核心,为了使词清空,大致有如下要求:一是意趣超远,而“命意贵远”,不宜胶着于题材的狭窄范围,意境开阔,有寄托,有新气。二是用事典要“融化不涩”做到“用事不为事使”,这样避免质实。三是虚字活用,可以避免质实的缺陷而使词意活转灵活,左右盘旋,清空有致。四是要做到“峭拔”还得使用“健笔”。对于婉约和豪放都有所取舍,而清空则是取婉约词的典雅深婉,取豪放词的厉健开阔而一之^{[21]278}。张思齐《词的文质及理论探微——从〈词论〉到〈词源〉》认为:“清空说反对繁缛和质实,提倡简炼空灵的词风。”在他看来,清空说的产生是为了救弊纠偏,目标指向吴文英等人词风。并指出清空说有三个意义:一是从词的技巧上把词的风格分为清空和质实两派,以姜夔为清空一派的代表,以吴文英为质实一派的代表。以后朱孝藏以疏与密分词为两派实质上仍是清空与质实说的继续。清空说从技巧上区分词的风格,侧重考虑的是词的表面肌质。与诗讲肌理一样,张炎把难以捉摸的词风问题落实到句法、字面、用字、音律等具体问题上。二是从作词法解决词的风格问题。三是将诗学中钟嵘—司空图—严羽一系的理论移植于词的领域,使词学具有一个理论上的体系,可以谓之学^{[21]88-94}。邓承奇《张炎〈词源〉新论》强调,清空是张炎论词的精粹和独创,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最高标准。“清空”风格有两个特点:一是意趣必须高远、幽深、蕴藉。二是要求语言清新自然,质朴玲珑,落落欲往,矫矫不群,如行云流水,不漏斧凿痕迹。“总的来说,清空并不意味着空虚,无实际的内容,而是必须立足高,构思深,达到‘篇中有余味’、‘句中有馀意’、似清气盘空,类野云孤飞,潇洒纵横,冲淡自然”^{[17]48-50}。马兴荣《试论张炎的北行及其〈词源〉、词作》指出张炎“清空”之清,指品格高迈、胸次澄净。空,指境界空灵。这与司空图所谓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梅尧臣说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颇为相近。意思为,词人要描写、抒发的人、物、景、情等等,不在字面上攀形绘色,留下痕迹,而读者却可透过字面,引起共鸣^{[23]18-24}。邱世友《张炎论词的清空》则认为“清表现在意,空表现在境,即意要清新,境要空灵”^{[24]157-158}。

4. 关于《词源》价值、地位和影响

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不断地对《词源》价值、地位和影响作出新的考量。周笃文《宋词》认为,张炎《词源》是一部权威性的理论著作,对当时和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论述乐律的部分,保存了有关词乐的丰富资料,可为词林瑰宝^{[25]116}。王延龄《〈词源〉八十四调名笺释》称它是一部近于词学通论著作。吴熊和《唐宋词通论》中则对《词源》下卷所倡的“雅正”、“清空”之说提出了批评:“《词源》的清空之说,是宋末词风弊病在理论上的表现之一。而崇尚清空的结果,词的最终衰落,就愈发不可避免了。”^{[26]318}孙立《张炎词学理论的美学意义》认为,张炎《词源》对词的艺术特征作了客观、具体的总结,并相应形成了完整的审美体系。从词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张炎的文学观念尽管有一定局限性,然其理论的合理价值还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刘庆云、谢国荣《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认为《词源》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音律讲究、创作方法、审美要求等,其影响不仅及于浙西词派,而且也及于常州词派及其他词人、词论家。张炎对后世词论家及作词者的影响为:一是《词源》提倡协律,几乎为后世各派词论家所遵奉。二是《词源》倡“雅正”,为后世进一步尊体开示法门。三是《词源》倡导的“清空”,成为浙西词派推崇的最高境界^[18]。杨海明《张炎词研究》则将《词源》与王灼《碧鸡漫志》、沈义父的《乐府指迷》作比较,高度评价《词源》,认为其为三部词学著作中理论性最强的一部^{[15]186}。

5. 《词源》内容考校与疏释

继清人之后,有学者仍然对《词源》作内容考校与疏释工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中郑孟津、吴平山《词源解笺》^[27]是自郑文焯《词源斟律》和蔡嵩云《词源疏证》之后,对于《词源》声律部分阐释最为详尽的一部著作。似乎是从夏承焘《词源注》开始,研究者对张炎词的声律理论往往避而不谈,这就更反映出《词源解笺》的可贵之处。该书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其旁征博引,凡解读《词源》卷所应参阅的资料几乎完全齐备,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所作注释都非常精到,可谓思精体宏。吉联抗《〈词源·讴曲旨要〉试译》(《中国音乐》1983年第3期)则主要对《词源·偶去旨要》进行疏释。此外相关研究还有丘琼荪《白石道人歌曲通考》(音乐出版社1959年版)之《词源讴曲旨要浅释》、何昌林《宋代音乐文献中的“歌诀”研究(下)——〈词源·讴曲旨要〉诀》(《音乐艺术》

1984年第2期)、赵尊岳《玉田生〈讴歌要旨〉八首解笺》(《词学》1983年第2辑)、饶宗颐《玉田讴歌八首字诂》(《词话丛刊》1958年第1期)、洛地《“润”为“角”(调)与“勾”——张炎〈词源〉读后笔记》(《音乐艺术》1991年第1期)等。

除上述之外,一些新出版的文学史及论文专著中对张炎也有所论及。仅就文学史而言,有黄拔荆《词史》、程千帆和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章正《中国宋辽金夏文学史》、杨海明的《唐宋词史》、章培恒及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在这些文学史中有些已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但论述往往过于简略。

中国台湾地区及海外也有许多学者在关注着《词源》,如J.Z.爱门森《清空的浑厚——姜白石文艺思想纵横》^[20]、明木茂夫《〈词源〉犯调考》(《九州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1993年)、《〈词源〉宫调俗名考》(《中国文学论集》1995年)、松尾肇子《明清对〈词源〉的接受》(《汲古》1998年6月)与《词源と乐府指谜》(《日本中国学会报》1985年1月)、刘汉初《清空与骚雅——张炎词初论》(1997年台湾清华大学主办第一届中国古典文学国际研讨会:先秦至南宋)及刘少雄《论张炎的词学理论及其词笔》(《台北师院语文集刊》1998年)等。

整个20世纪《词源》研究在版本考订、内容考释等方面均有所展开,而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伴随着词学以及词学批评的兴盛,对于《词源》的词学主张以及词学评判标准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但是,总体而言,《词源》研究依然存有拓展的空间,例如对于《词源》的音乐,尤其是音律研究相对于其他方面较为滞后。再如,立足于词学本位的研究并不突出。

三、21世纪《词源》研究

新世纪以来,张炎《词源》研究接续了20世纪末的余绪,呈现出视角多元化与体系化、细化的特点,形成了新的研究趋势。笔者《新世纪以来张炎〈词源〉研究述评》(《武陵学刊》2013年第3期)一文对此已作详细梳理,今从略论之。

“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历久而常新的题目。围绕以“雅”为中心的论词标准,方智范等人所著《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修订版)、李岳、朱国林《论〈词源〉中之“骚雅”》(《长江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颜祥林《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张萧绎结合姜夔词作成《从白石词看张炎〈词源〉中“骚雅”之义》(《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郭锋《论宋代词学的“骚雅”》(《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许海《张炎的雅词理论与创作实践》(《五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朱崇才《词话史》等,都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尽管不同时空的人由于主客观条件有异,在释解“雅”的标准时不尽一致。但是,经过数代人的梳理,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上探索出一条相对客观准确的阐释路径,即应怀有“了解之同情”,尽量还原到张炎所处的语境,将其词评与所评之词紧密结合起来去阐述之。

关于“清空”境界的解读,也是见仁见智。陶尔夫与刘敬圻《南宋词史》、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朱崇才《词话史》、方智范等人所编《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李晓云《析张炎的清空论》(《鄂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颜祥林《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马丽娜《张炎“清空”观新论》(《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清空”境界的多重解读客观上折射出学者们多元化的词学观,这种讨论的持续本身反映了张炎词学研究的兴盛。尽管解读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张炎的词学世界里,“清空”只能有一种一以贯之的解释。还原历史语境,结合当时的词学观,方可更加真实地接近作者原意。孙克强《词学史上的清空论》(《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在解读路径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他在对“清空”字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姜夔词作出发,结合词的音乐属性加以考量,最后整合诸家之说,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清空”观。

许多学者又对《词源》价值重新进行估衡。如余传棚《唐宋词流派研究》、石兰思与张靖《从〈词源〉看张炎的词学观》(《今日南国》2008年第12期)、王昊与张秋爽《〈词源〉片论》(《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张秋娟硕士学位论文《张炎词学思想探微》(陕西师范大学2004年)、颜祥林《张炎〈词源〉词学思想三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等分别从文学史、学术史、词学史、批评史或词律史等不同角度去观照《词源》的重要性。可以说《词源》的价值大小,根本取决于研究者将其纳入何种体系中加以考量。

与20世纪学者着重强调《词源》的外围研究不同,新世纪十余年来学者主要是立足词学学科本身,深入并广泛地探讨了《词源》的概念和体系。但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并没有转移,尽管研究得更为深入与细化,但总体上来看依然是围绕“雅正”观、“清空”说及《词源》价值估衡展开。在研究趋势方面最大的特点是视角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学者或从比较学、接受学等不同视角对其进行观照,得出来不同于以往的新结论。如比较研究方面有王雨容《〈乐府指迷〉及〈词源〉的论词范例之比较》(《琼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接受学方面研究有傅蓉蓉《论〈词源〉理论在清代的接受》(《求索》2009年第1期)与丘斯迈《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此外,更有学者将《词源》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以确定其形成的根由或者对其他文体的影响。如尚慧萍《论〈词源〉词学思想形成与宋代文化的关系》(《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及叶露《略论〈词源〉对词体的影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等。论及研究趋势,除上述所及的视角多元化之外,还有一个倾向即张炎《词源》研究趋向细化。如徐文武博士学位论文《〈词源〉及其词论史影响研究》(河北大学2007年)可为代表,其以张炎《词源》的词论为研究对象,专门探讨《词源》对金、元、明、清以及近代词论产生的影响。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张炎《词源》研究成绩巨大,并且伴随着词学以及词学批评的兴盛,研究趋势顺应了时代潮流:一是观照视角多元化,二是研究趋向细化。相信这一趋势还会进一步增强。但是,就整体而言,张炎《词源》研究仍存有一些不足,如近十余年仅出版一部专著(翦伯象著《张炎词学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版),这与研究对象本身的词学史地位很不相称,同时也依然存有需要拓展的空间:一是《词源》的音乐,尤其是音律研究裹足不前;二是立足于词学本位的研究依然并不突出;三是《词源》理论解读与张炎词作分析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些都将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张炎.词源:卷下[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陆辅之.词旨[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周仁,整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
- [4]张炎.山中白云词[M].吴则虞,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沈曾植.金瓶梅温故录[M]//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宋辽金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6]曾毅.中国文学史[M].上海:泰东图书局,1915.
- [7]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光明书局,1925.
- [8]胡云翼.宋词研究[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26.
- [9]朱东润.中国批评史大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10]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1]夏承焘.读张炎的词源——词史札丛之一[N].光明日报,1960-02-07.
- [12]夏承焘.词源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13]曹保合.谈张炎的清雅词论[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98(1):44-49.
- [14]杨海明.论《词源》的论词主旨:兼论南宋后期的词学风尚[C]//杨海明词学文集:第4册.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
- [15]杨海明.张炎词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9.
- [16]杨佐义.张炎《词源》论词标准初探[J].东北师大学报,1989(6):81-86.
- [17]邓承奇.张炎《词源》新论[J].齐鲁学刊,1989(3):48-50.
- [18]刘庆云、谢国荣.试论张炎《词源》对后世词论的影响[J].湘潭大学学报,1990(3):96-102.
- [19]单书安.张炎词论浅议[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2):77-79,85.
- [20]孙立.张炎词学理论的美学意义[J].南京师大学报,1992(2):51-55.
- [21]谢桃坊.宋词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22]张思齐.词的质及理论探微:从《词论》到《词源》[J].海南大学学报,1995(1):88-94.

- [23]马兴荣.试论张炎的北行及其《词源》、词作[J].楚雄师专学报,1991(4):18-24.
[24]邱世友.张炎论词的清空[J].文学评论,1990(1):157-158.
[25]周笃文.宋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6]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27]郑孟津,吴平山.词源解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
[28]J·Z·爱门森.清空的浑厚:姜白石文艺思想纵横[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A Review of the Study on Zhang Yan's *Ci Yuan*

Luo Haiyan¹, Yu Guangjie²

(1.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171, China)

Abstract: Zhang Yan's *Ci Yuan* embodies his main thoughts on Ci, which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i. Later generations have been in the study on it.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the research mainly on its editions and content, theory,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i. After the 20th Century, the research on *Ci Yuan* came into the modernization, and become prosperity, which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meaning, discriminating Ya-zheng, explaining the Qing-kong, considering the value and influence and so on. Since the new century, the study has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and present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with forming a new research trend, such as the view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systematization.

Key words: Zhang Yan; *Ci Yuan*; Ya-zheng; Qing-kong; Ci theory

(责任编辑 王作)

(上接第60页)

Relevant Problems Research of Bronze Belt Plaques Unearthed from Tomb of State Qin

Zhang Zhengy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The unearthed bronze belt plaques only appeared in the tomb of State Qin in the Wei river basin as of now, its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istory of Qi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Qin moved the capital several times, the war from the Rongdi tribe and State Qin and many Rongdi cultural factors in tomb of State Qin, under the long-term influence from the State Qin and the surrounding Rongdi tribe, the decorations with strong Rongdi style become very popular in State Qin and into their lives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bronze belt plaques; tomb of State Qin; Qin dynasty; Rongdi tribe; culture

(责任编辑 张春生)